

## 評介鄭永常《海禁的轉折—— 明初東亞沿海國際形勢與 鄭和下西洋》<sup>\*</sup>

林佑儒<sup>\*\*</sup>

書名：《海禁的轉折——明初東亞沿海國際形勢與鄭和下西洋》

作者：鄭永常

出版時地：臺北，稻鄉出版社，2011 年

頁數：264 頁

—

鄭和下西洋的研究經累積幾十年的成果，如今已汗牛充棟。即便如此，當 2011 年初巧見鄭永常的新書《海禁的轉折——明初東亞沿海國際形勢與鄭和下西洋》時，書的副標題有鄭和二字，仍令筆者為之好奇，似乎學界又有新的鄭和研究視角。作者為國立成功

---

<sup>\*</sup> 本篇書評承蒙兩位審查人的細心閱讀與指正，同時也感謝陳國棟教授的教導，讓筆者有很大的啟發，在此特別致謝。

<sup>\*\*</sup>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。

大學歷史學系教授，早先研究中越關係史，近年來投入明代海洋貿易與政策研究，鑽研的課題有明初海禁、朝貢貿易與鄭和下西洋等，研究成果可謂豐富。

關於歷來鄭和下西洋的課題，徐泓的研究回顧認為，每有新說，不外是政治、外交與經貿的範疇。<sup>1</sup>作者基本上認同徐泓的主張，即鄭和下西洋乃實現「天朝禮制體系」的外交手段。只是，過去的學者多從鄭和下西洋的過程和結果所產生的現象，來探討鄭和下西洋的原因。作者認為這是倒果為因的研究角度，正確的方法應是從宋元以來的海洋貿易發展，以及明朝初期可能面對的外在政經局勢來觀察（自序 VII）。簡言之，便是順著歷史發展看鄭和下西洋。同時，作者長年關注明代海洋貿易的發展，其視野已延伸至 14-15 世紀的東亞世界，因而能切實知道各國間彼此存在的複雜關係。在本書出版之前，已有探索鄭和下西洋的背景與東亞諸國關係的作品，其中，邱炫煜的《明帝國與南海諸藩國關係的演變》第三章〈洪武初年到宣德五年明帝國與南海諸藩國〉在時間上與本書相仿。<sup>2</sup>相較於鄭作，邱作本於明朝主體的政治發展，來簡述東亞各國的發展脈絡，尤其最多是集中於暹羅與安南的討論，南洋群島的情況則一概不論，整體看來，邱作無法說明鄭和出航與東亞局勢變動的關聯。作者的新書，則擴充了研究視角，其議題雖早被過度發揮，如今還有可看性，更值得繼續研討。

---

<sup>1</sup> 與此些課題相關之研究史回顧見徐泓：〈鄭和下西洋目的與性質研究回顧〉，《東吳歷史學報》，16（臺北，2006.12），頁25-51。即使大陸學者的近作：楊樵，《鄭和下西洋史探》也是以明朝為出發點，不過他的第六章〈鄭和出使西洋的主要事跡〉也像鄭永常這本書一一對各國情況描述，不過他仍是本於鄭和下西洋後的結果論斷鄭和的功勞，詳細內容考見該書第七章〈鄭和下西洋的功績和影響〉。

<sup>2</sup> 邱炫煜，《明帝國與南海諸藩國關係的演變》（臺北：蘭臺出版社，1995），頁107-222。

## 二

本書是作者近年來研究鄭和的成果。其實，這本新書的整體內容與作者前書《來自海洋的挑戰——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研究》的第二章〈朝貢貿易體制的建構與挫折〉和第三章〈重建朝貢貿易體制及南海國際秩序〉相仿，而且觀點及結論未超過前作。但是，這本新作在研究方法上，特別突顯南海各國的發展過程，以各國當時遇到的政治和經濟困難，及諸國的衝突，再與鄭和下西洋的動機與目的作連結，從而使吾人能清晰地見到更廣泛的歷史圖像，而不是僅拘泥於以「鄭和偉大航海」為核心的史觀中。

誠如序文所言：「本書是繼《來自海洋的挑戰——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研究》一書的餘緒寫成。前一書是大脈絡的研究……是縱的論述，而本書是橫的研究……是以東亞局勢的整體研究著手，從而得知當時東亞各國間的互動關係皆有脈絡可尋」。可見作者寫本書的意圖，正是立基於先前的基礎，以朝貢關係為緯，以地域關係為經，使之成為舊瓶裝新酒的作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書的研究視角，是從分析明初東南沿海諸國的情勢，來建構鄭和下西洋的背景。因而就空間範圍來看，本書所討論的「西洋」不包含南印度航道的「西洋」，而是限定在中南半島與馬來群島的周邊諸國。<sup>3</sup>

除研究方法的獨創性，本書的史料運用頗為豐富，除了使用最基本的《明太祖實錄》、《明成祖實錄》與《明宣宗實錄》等官修史書外，亦大量使用鄭和船隊隨行船員的記錄，如馬歡《瀛涯勝

<sup>3</sup> 當時的「西洋」實指南印度航道，其主要據點是印度的古里，見陳國棟，〈鄭和船隊下西洋的動機：蘇木、胡椒與長頸鹿〉，收入氏著《東亞海域一千年》（臺北：遠流，2005），頁124-126；鄭永常，《海禁的轉折——明初東亞沿海國際形勢與鄭和下西洋》，頁117-119。另外，鄭永常亦從馬歡，《瀛涯勝覽》和鞏珍，《西洋番國記》等文獻推測出：明初時人認定西洋各國的「開端」應為蘇門答臘島北端的蘇門答刺國。總之，明初認知的西洋定義，大體上是從蘇門答臘島北端—南印度古里—阿拉伯半島等區域。

覽》、鞏珍《西洋番國記》、費信《星槎勝覽》等書，另外還有方志。<sup>4</sup>不過。本書既然已在副標題名之「明初東亞沿海國際形勢」，卻未有中國以外的外文文獻或翻譯史料補充。也許是南海諸國未留下文字記錄，但是晚到的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卻有相關文獻，可資補充。日後，作者或可就外文資料再進行研究範圍的擴充，方可在論述史實時更為圓滿。

從鄭作內容結構來看，除了序言，以及第二篇〈海洋交流：宋元時期沿海國際情勢〉（後者概略描述在宋元時期，中國和東亞各國的政治和商貿關係）外，第三篇到第八篇的文章，為本書所論述的主體。第三篇〈南海島主：爪哇滿者伯夷的興衰〉，以當今位於印尼爪哇的滿者伯夷（Majapahit）王國為主。明太祖在建立朝貢體制後，與爪哇（Java）地區的大國滿者伯夷發生藩屬之爭。日後，明太祖在此地的外交政策失敗，導致除了爪哇、暹羅（Siam）和占城（Champa）等國與明朝尚有朝貢外，其他諸國，包括西方勢力，都受到爪哇滿者伯夷的控制。明朝遭遇到國際關係的失利，所以成祖即位後便對此進行革新，重新訂立海外的宗藩關係，並逐步確立明朝在國際上的地位，將明帝國的威望推到歷史的新高；第四篇〈東海揚波：日本幕府將軍的妥協〉，本篇討論室町幕府足利義滿與明朝的關係。相較於其他文章，這篇相對較具國際形勢的討論，文中顯示，明初的中日關係衝突，其經濟的因素並不明顯。鄭和船隊捲入對日交談，是明成祖為了鄭和下西洋，並同時維護海防，而做了一系列的對日協商，最後和日本幕府達成「捕倭寇」的共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作者認為鄭和確實在永樂二年前往日本，但這是為下西洋所作的準備，與日後下西洋屬於不同性質的任務。作者在文末還建構鄭和與明使節到日本調節「捕倭」的事宜，這樣的

<sup>4</sup> 關於明實錄與三本鄭和隨行船員的史料可信度，陳信雄很清楚地提到鄭和所到之處的記載，成祖和宣宗實錄有其重要性，值得注意的是，隨行船員的文獻中，僅有馬歡和鞏珍較可性，而費信之作，特別是後半部的真實性，因費氏本人便未到達，故受人懷疑。見陳信雄，〈鄭和船隊究竟到過哪些地方〉，收於陳信雄、陳玉女主編，《鄭和下西洋——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稻鄉出版社，2003），頁261-264。

寫法值得學界參考，此讓讀者能清楚了解這件史實的來龍去脈（頁 93-100）。第五篇〈海峽風雲：舊港和蘇門答刺的起落〉，乍看之下，該主題是指取代原先統治蘇門答刺地區的三佛齊（*Srivijaya*），而受滿者伯夷扶持的「陳祖義」。實際上，作者有更大的用意，亦即考察馬六甲海峽旁的蘇門答臘國，在歷經十數年的政權轉移而造成經濟停滯，連同破壞原先海峽經貿中心的地位。第六篇〈地峽雄主：阿瑜陀耶的委屈〉，則是討論暹羅與國王阿瑜陀耶（*Ayutthaya*）和鄭和的關係。鄭和第二次下西洋時，首度經過暹羅的克拉地海峽，此舉有警告暹羅國王必須顧及明朝威望的意義。而後，鄭氏艦隊第三次造訪暹羅，其目的是扶持滿刺加的獨立，並削弱暹羅在東南亞的影響力。第七篇〈海峽外府：新國際貿易中心滿刺加〉，則在探討取代蘇門答刺經貿地位的滿刺加國（*Malacca*），及其國主拜里迷蘇刺（*Parameswara*）在馬六甲崛起的事蹟。作者考察滿刺加從一個遭到滿者伯夷壓迫的小國，受到明政府的支持和鄭和實際行動的保護後，逐漸成為明帝國對「西洋」貿易管理的「總路頭」，並於 15-16 世紀，躍昇為馬六甲周邊海域的金融中心。

### 三

從第三篇到第七篇的內容顯示彼此之間有關聯性，可見鄭和下西洋的背景中，南海諸國與東亞地區，都具有政治與經濟上的互動性。作者在第八篇，〈總論：鄭和下西洋的意義〉總結一個鄭和下西洋的重要論點，即鄭和把明朝的威望提到最高外，連帶擴展明帝國海軍在印度洋的活動，展現了中國海洋活動從宋元的民間性質走向國家性質。同時，這還是以「儒家」為核心的帝國思想作其指導。鄭和下西洋，並非可單純以利益和擴張殖民為宗旨的馬漢（*Alfred Thayer Mahan*）「海權論」所概括（頁 191-192）。馬漢的海權論是否能解釋鄭和下西洋的效益，本身便值得批判。只是，作者沒再深

刻探討，以海權論研究鄭和時所帶來的學術爭議。作者也並未論證明帝國如何藉由海洋貿易，具體實踐以儒家為核心的治國理念。儒家思想成為明帝國行動展現的意識形態，在本書著墨甚少，較為可惜。而文中對鄭和下西洋的政治思想意義，以及與近代西方海權的比較，相較於其他類型的鄭和研究較少，這方面應該可作為作者在未來研究的另一個方向。

作者並不將這本書視為純粹經濟史的專書。他認為過去吳晗與徐玉虎的研究，過於擴大經濟因素作為鄭和下西洋的第一義。對作者而言，下西洋是國際問題而非經濟問題，是皇家意志的海外延伸而非現實經濟因素的考量（頁 30-31）。<sup>5</sup>作者在附錄有〈下西洋海船造價耗費估算〉一文，表示鄭和與這場盛況空前的皇家海洋艦隊，被往後的士大夫認為是賠本生意，其經濟效益真的不高（頁 189）。然而單就海洋艦隊的失利，而淡化明初可能存在的經濟困境，作者的見解似乎有待商榷，許多前人研究已重視到，明初的中國，的確需要外來物資補充國內的需求。

首先，如同陳文石所說：「明代的海禁政策、貢舶貿易、對外關係（海上諸國），三者可說是密相關聯的。」<sup>6</sup>。明太祖雖實施海禁政策，也不可能完全斷絕外商與中國的貿易。特別是沿海商人，因迫於生活的困頓，不乏有鋌而走險的冒險者。待到鄭和下西洋，在宣揚天朝國威的同時，也確立了政治—經貿在東亞海域的影響力。從往來明朝與海外的朝貢貨品來看，中國的確需要一些外國原料來滿足國內的生活所需。陳國棟曾說明，14 世紀末以前，印度南部與爪哇為主要的胡椒產地，明代前期 200 年間，中國大量倚賴海外產品，其中，蘇木與胡椒為代表，而這些貨品在洪武朝被當作官員俸餉，往後數代也維持這樣的供應模式。從《明英宗實錄》

<sup>5</sup> 吳晗，〈十六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〉，收入萬明等編，《鄭和研究百年論文選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39-59；徐玉虎，《鄭和評傳》（臺北：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，1958），頁16。

<sup>6</sup> 陳文石，〈海禁政策下的貢舶貿易〉，《明洪武嘉靖間的海禁政策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，1966），頁41。

所見，在鄭和結束下西洋之旅的後三年，南京官庫還是有 300 斤以上的蘇木與胡椒。即使 1433 年後，下西洋活動不再，但朝貢貿易的南洋貨品中，仍以蘇木和胡椒為大宗，更遑論 16 世紀後民間走私的貨品中，還有這些日常的必需品。

其次，1433 年後，中國海商消失在印度洋，其原因便是蘇門答臘開始大量種植蘇木與胡椒，取代了原先南印度的地位。<sup>7</sup>曹永和也提過，從明初以來，南海香藥為當時國人相當需要的資源<sup>8</sup>，無論皇家貿易或是走私都少不了。

復次，作者雖關注在明朝與南海諸國的情勢關係，但仔細探究本書的問題意識，即明朝的對外政策：「朝貢貿易」，其本身就是政經合一的性質。朝貢貿易所主導的國際關係，是南海諸國對中國貿易的需求、中國對南海貨品的需求。至於和朝貢貿易所抗衡的，則是沿海人民因經濟困頓，冒險成為海盜，或是落居異地成為華僑，並與控制當地政經的異國國主合作。質言之，作者的論述，總不能擺脫經濟的因素。

在本書中，吾人可見到兩個與「朝貢貿易」相關的問題：其一是大明帝國對於海外經濟和政治控制，這可自洪武晚年的朝貢貿易崩解來看。就經濟因素而言，是明朝面對海外貨物供應不足的困境。其二是永樂如何革新朝貢貿易的國策，其關鍵是控制南海兩個強權，這個導火線來自於爪哇和暹羅對南海諸國貿易的控制權。明帝國為了維持前一個命題，需藉由「朝貢貿易」的體系，達到天朝系統的國際政經關係。在行動上，便對原先南海的強權，宣示明朝擁有宗藩之權力。順著這兩個問題意識，並配合這本書論述各個主題，作者因而能在第八篇定義宋元和明朝在「東亞朝貢」實為不同性質。

關於上述第一個問題，在第三篇〈南海島主：爪哇滿者伯夷的

<sup>7</sup> 陳國棟，〈鄭和船隊下西洋的動機：蘇木、胡椒與長頸鹿〉，收入氏著《東亞海域一千年》（臺北：曹永和文教基金會，2005），頁102-126。

<sup>8</sup> 曹永和，《中國海洋史論集》（臺北：聯經，2000），頁71。

興衰〉中。作者首先從明太祖海禁的背景談起，並連接鄭和下西洋的動機，他批評過去的學者理解洪武初期諸藩朝貢之盛，而晚期卻是衰頹，卻都沒細究其因。經由這個問題意識，他認為論述鄭和下西洋時，必考慮明初遭遇的國際情勢。洪武開國之初，爪哇對中南半島有極強的政治實力，如藩屬淳泥（*Brunei*）在洪武四年首次來中國進貢後，便被滿者伯夷給阻擾，此後也不再入貢。作者推斷：「明朝的威望當時似不及滿者伯夷」（頁 34）。至於三佛齊，則從洪武四年起數度入貢，太祖有意栽培該國成為海外朝貢體系的中介國，於是贈其高度藩屬意義的「國王之印」給三佛齊的新王。但派出冊封三佛齊的使團再也沒回國了，原因是三佛齊臣服明朝，明顯是要挑戰爪哇的南海地位，而觸動爪哇的政治神經，於是爪哇出兵滅掉三佛齊，也一同屠殺冊封使團，表示不惜與中國為敵。明太祖對這件事的處理顯得低調許多，甚至也釋放了爪哇的使團，要求爪哇國主自行反省，但日後逐漸淡化與爪哇的來往。從洪武十六年後，爪哇僅進貢二次，爪哇勢力以內的馬六甲海峽周邊諸國，亦不再入貢，僅存中南半島諸國。以洪武十六年為分水嶺，太祖處理爪哇之事後，更加地限縮朝貢體制，並把朝貢與貿易一體化，此乃明代以來「朝貢貿易」的原型。要之，朝貢國得具有「勘合文冊」才能從事貿易活動，而這個制度最初便是設計給南海諸國，爪哇則在種新型朝貢體系下被視為拒絕往來戶。

只是，太祖用行政和經濟措施對爪哇制裁，也一同讓朝貢貿易停擺，畢竟蘇木、胡椒和香料出產大宗的南洋群島，幾乎都為爪哇的滿者伯夷所控制。因此在太祖的晚年，由於朝貢體系的失敗，除來華貢舶船稀少，民生經濟需求的南海香藥更是供應匱乏。太祖一意孤行所造成的朝貢體系的破敗和民生物資缺乏，已足夠說明鄭和下西洋具有一定的經濟動機。

至於第二個問題，得從永樂怎來革新「朝貢貿易」來看。質言之，永樂雖延續洪武的朝貢貿易，但是他的任務是重現洪武初期萬國來貢，以及海外貨品的正常供應。前提則是得建立在「祖制」，

即朝貢貿易的體系下才能完成。誠如作者所言：「明成祖較明太祖現實及了解人性的願望，那就是海外國家前來中國朝貢著重在有利可圖上。」（頁 51）成祖懂得以「德」服人，達到四夷賓服的政治理想。其政策背後的推動力是建立在經貿上的「利」與軍事上的「力」。

在永樂朝，首先要解決的是滿者伯夷對諸國朝貢的控制，與此同時，滿者伯夷發生東西王內戰之事，讓爪哇勢力大衰。得勝的爪哇西王又獲知鄭和艦隊殲滅陳祖義，以及明朝 80 萬大軍平定安南之事，這已震撼爪哇國主。西爪哇王雖在內戰時誤殺明朝使節，卻因南海局勢的變化得向明朝釋出善意。隨著鄭和第二次下西洋，順勢直接警告了爪哇。經過此事，爪哇控制的南海諸國可恢復向明朝朝貢，如永樂三年淳泥來朝，而後又數度來貢，爪哇皆未加阻礙。此外，正常化南海諸國的朝貢活動，除了靠國與國的外交互動外，海外戰爭也是個手段。上述提到的三佛齊在被滿者伯夷亡國後，馬六甲海峽已被舊港的華人陳祖義所控制，鄭和最後血洗舊港，並俘虜陳祖義，這場大戰可以稱得上是明朝與爪哇鬥爭的延伸。誠如作者所言，阿拉伯及印度的西來船隻受到舊港的阻撓，只能停靠海峽西邊的蘇門答剌國做生意，或是穿越克拉（Kra）地峽做生意，因此西方船隊難以入京朝貢。若不讓馬六甲海峽打通，使其航道暢行無阻，則朝貢體系無法完善進行。於是鄭和對舊港的戰勝，可謂強化朝廷政策的推行。

第二個問題最後歸結到，滿刺加取代蘇門答臘北端的蘇門答剌國，而成為鄭和下西洋後期的「總路頭」。成祖重視此地在馬六甲海峽的獨立地位與作用，而滿刺加亦在鄭和首次下西洋後，於永樂五年入貢。永樂九年，拜里迷蘇剌親率眷屬入貢，可見滿刺加急需明朝幫助自己壯大國力，且在經濟上有所需求。成祖欣賞拜里迷蘇剌的忠誠，並理解到海峽複雜的地域關係，極有可能影響當地進入明朝的貿易，再加上蘇門答剌國的衰退，於是授命鄭和在永樂十年第四次下西洋，正式在此地設立外府。在明朝的保護下，鄭和艦隊

的活動也助長該地國防安全和經濟的需求，最終使滿刺加逐漸成為東西洋的貿易轉運中心，並奠定了日後馬六甲強盛的基礎。

另一方面，在爪哇等國不再進貢時，暹羅雖曾對洪武朝提供了胡椒、蘇木等物產的貢品，對明初經濟有所幫助。但暹羅顧及自身為克拉地海峽貿易的中心，當明朝希望暹羅調節馬六甲海峽衝突時，國王阿瑜陀耶卻刻意迴避這個要求。待到成祖即位後，讓馬六甲暢通無阻以便貿易，成為鄭和下西洋的目的，明朝終可靠著日漸強大的東亞威權牽制暹羅在南海的影響力。

#### 四

鄭和下西洋的動機具有一定的經濟因素。在配合成祖所革新的朝貢貿易制度下，明朝執行一系列的國際政經活動。無論牽制爪哇、暹羅的勢力，或是扶持滿刺加的國勢，除了彰顯明朝國威外，讓貿易順遂的目的亦存在。因此鄭和艦隊耗資甚大，取回海外貿易的利潤未必划算，但在維護朝貢貿易與海外物資順利來華等目的下，鄭和下西洋的活動是有一定程度的經濟考量，何況經濟的動機也未與維護天朝威嚴的動機相衝突。

除上述的經濟因素的討論外，作者的一席話，也值得對鄭和研究提出反思，即「鄭和研究仍有很多可繼續的方向，特別是文化層面的研究，過去一段時間，學者們提出很多不同的或冠冕堂皇的理由來猜測鄭和下西洋的原因，若是歷史問題還是要回歸歷史研究才有出路。」（頁 VIII）。

「鄭和」雖早為政治、外交、軍事或經貿等議題所充斥，使得近年來的研究，漸漸轉向文化史的取向，以及探索鄭和歷史記憶與歷史形象<sup>9</sup>，甚至有跨領域的趨勢。但無論研究什麼課題，甚至是

---

<sup>9</sup> 關於鄭和的傳說流變與形象的討論，請見陳芷凡，〈海洋作為一種「視野」——臺灣鄭和傳說中的文化他者與想像〉，《臺灣文學研究學報》，11（臺南，2010.10），頁221-256；黃秀政，〈「鄭和到台灣」傳說考釋〉，《臺灣文獻》，56：3（臺北，

相關理論的引用，若是站在討論「歷史上」的鄭和的立場，仍是要以歷史的發展和方法為本。文末在此感謝作者撰寫了這本新書，更期待他對這些相關課題有更獨特的新見解，讓吾人能瞭解更多層次的「鄭和」。

---

2005.09），頁157-179；江政寬、陳秀卿，〈歷史與傳說：鄭和船隊到過臺灣？〉，收入《鄭和下西洋——國際學術研討論文集》（臺北：稻鄉出版社，2003），頁131-161；周婉窈，〈山在瑤波碧浪中——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〉，《臺大歷史學報》，40（臺北，2007.12），頁93-148。

